

# 德国汉学家 在 1933-1945 年的迁移

——重提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

〔美〕柯马丁

Martin Kern / (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



在德国纳粹政权统治时期，绝大多数从事汉学与东亚艺术史研究的德国青年学者，和一些已确立地位的德国学者，离开他们的国家迁往它地继续其学术生涯，尤其是前往美国。若不提及五十年前所发生的这一幕——一方面是德国知识与创造力的广泛损失，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些学者在美国学术机构的有效发展，——就几乎不能阐释当前国际汉学研究的状况。迁移者尽管通过他们的学生薪火相传，这些富於戏剧性的迁移影响甚远，但它们还从未成为一个被分析与讨论的话题。

五十年来在这一问题上似乎普遍一致的、刻意的沉默，使得重建汉学和东亚艺术史研究变迁的细节变得愈加困难。同时，历史撰述反思上的连续受挫，其本身就成为一种持久的历史现象，那就是：一种对学术反省的谨严的争议。

在1949年，华盛顿大学中国史教授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以一段批判性的言论，开始他的《今日德国汉学》一文：

与在过去所有的学术中心及在美因兹新增加

的一个学术机构中德国学术生活的复活这一普遍趋势相比，德国汉学恢复的步履相当缓慢。一些远东研究原有的主要席位仍然空缺。造成这一特殊情形的原因，首先是缺乏研究人员。

学术研究人员到哪里去了？如卫德明所言，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离开，这是纳粹主义从兴起到衰败所产生的种种后果，由於直接或间接的原因，即战争和战争的后果：一些学者去世了；一些学者仍旧从国外（尤其是中国）回国——他们主要是以德国学者或官方专业人员代表团的身份、而非移民身份，在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期间，甚至在之前就到中国去的；第三部分是那些因与纳粹有染，1945年后失去他们的职位而1949年前尚未重新就职的学者；最后，数量上和声望上都最为可观的，是那些根据1933年4月7日臭名昭著的《重建公务员队伍法》被开除出大学，以及1933年受纳粹恐怖威胁，作为反当权者离开祖国的学者。

本文要致力阐述的，即以上所提及的最后一个群体。在德国及移居地保留的关于他们的姓名、职位及迁移后果的记载，提供了洞知中国研究发展史的视角——没有这些了解，我们将很难理解

以往五十年中在西方学术界中这一领域的发展。

政治移民和二战後立即离开德国的人名单表明，从总体上看，迁移曾是欧洲职业性中国研究短暂历史中惟一最为重要的决裂。不仅单个的学者，而且整个领域和新的学术方法的移徙国外，在中国(和东亚)艺术史、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学、语言学诸领域尤为明显。除了致力於中国研究诸领域的学者，德国汉学失去了博物馆长、图书馆长、以及《泰亚》(Asia Major)杂志——1935年，这一关于中国研究“惟一具国际水准的德国专业杂志”出版终止。为了理解这一移徙造成的後果，了解以下事实亦非常重要，那就是汉学作为“我们的科学”(如卫德明惯於说的)在德国大学里拥有了自己合适的地位，存在了二十多年，但仍然是一个年轻而十分狭小的领域，尤其是与如近东、中东的传统“东方学”相比。例如，甲柏连孜(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在写作其先驱作品《汉语语法：不包括俚语与交际口语》时，曾是普通语言学教授(1878-1889年在莱比锡，後来在柏林)。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两位最杰出的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和劳弗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在德国未找到职位而在美国却找到了：夏德在哥伦比亚大学，劳弗尔在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在与过於冗长的迁移者名单相对照时，1933年设立的汉学教学职位数目之少令人震惊。第一个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德国职位晚至1909年在汉堡大学的前身“汉堡殖民学院”设立，其後仅有三个个别的职位：1912年在柏林，1922年在莱比锡，1925年在法兰克福。此外，汉学研究班和讲师职位在哥廷根和波恩设立，东亚艺术史研究在柏林、科隆、莱比锡和慕尼黑的博物馆进行。在纳粹执政期间，教授职位没有增加；第五个德国汉学职位直到1946年才在慕尼黑设立。

一些移民的学术成就使中国研究的新领域和

方法明确下来，如卫德明——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儿子——这样一个学者的生活和工作也显现了短暂的研究传统的崩溃。与一些早期的学科领域状况的报告的看法相反，1945年後，一种断裂的趋势强过连续的趋势，其後只是逐渐地，才出现一个德国汉学的新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像卫德明或埃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做教师对德国的损失也许比他们做研究者的损失还要严重。尽管我在本论文的第三部分中会追溯移民者在德国以外的经历，但在这里评价他们的视角仍然主要是德国式的。面对的主题包括两部分：移出和移入，而我对前者更有兴趣。关于战後德国学者在中国研究和东亚艺术史上的成就——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的概括性的赞许，在其他处可以找到。这里我也希望能探讨如此多的从事中国研究和东亚艺术史研究的学者怎样或在什么程度上在德国汉学领域内被承认和理解。依我之见，这一问题不仅仅在这一领域的历史撰述中，而且在从事中国研究的德国学者的自我意识上都至关重要，假如他们认为学科领域的现状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的话。在我的结论中(第四部分)，我将试图将移出与移入两个现象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并且考虑到对今天整个国际范围的一些影响。

在这项工作中，尚存在许多难点，需要事先加以考虑。首先，我并不试图展现在德国纳粹时期中国研究的全景，尽管这将有助於理解个体移居国外者决定离开他们的国家的方方面面。在许多个案中，像那些犹太学者或马克思主义者，自1933年後多半很快被大学驱逐(或从未找到通往学术位置的途径)，移居国外的动机显而易见。其他学者，那些没有立刻被纳粹政权视为德国社会敌人的，和那些没有经历过直接迫害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离开理由。这里，确定惟一的动机似乎是不可能也是不合适的，除非这一动机被移居者本人

明确不讳。移居或不移居在许多情形上基於诸多原因的相互作用，我将避免作出简单结论。

在移民的历史事件中——这一事件历越数年，与个人传记紧密相联，但仍然构成一个单个的历史现象——数条线索交织在一起：纳粹主义作为政治现象的出现；1933年後德国大学的一般形势；那一时期中国研究和东亚艺术史研究在学术界中的角色；个体的问题和不同的视角——个人的、政治的、学术的等等。局势的全景由这些不同的方面组成，并且需要基於制度史和个人传记的记载。然而，要了解移民的方方面面，我们首先需要查阅所有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的档案，其中有关於移民从哪里离开，又到哪里去了的记载。

以下概述显得十分清楚，即绝大多数中国研究及东亚艺术史研究的德国学者在1933年法令後离开他们的国家：除了勒辛(Ferdinand Lessing, 1882-1961)和西蒙(Walter Simon, 1893-1981)教授，大多数富有潜力的年轻讲师和新兴博士离开。我们因此期望这一极为重要的事件会被公众认识并在1945年後的年份里加以讨论，以便於我们能够根据丰富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来描述。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系统地陈述，我视这一特殊事实本身为一种进行中的历史。在我们这一领域中，对认识理解刚刚过去历史产生的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的失败，因而成为一种双面性的问题：一个被讨论的议题，以及，在此同时，理解移民这一历史现象的中心障碍。其结果是迟到的初步的研究尝试，这一尝试远非完整，但提供了一个姓名、日期的框架，後来者可以加以补充。對於单个学者的描述很不平均：对那些最有名的学者，因为他们曾获得为其出版纪念文集的荣誉，他们的生平被概括进传记图中，使得我能够获得较多的信息；對於那些逝去的学者，我们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讣告所提供的有价

值而可靠的资料。另一方面，對於仅有微名的学者，重建他们的生平有时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在我的叙述中间或有空白，是受制於遗留至今的材料的缺乏，而那些本应当在三四十年前做的工作——那时大多数学者还健在，可以进行个别咨询——而未做所造成的材料阙如，则是人为造成的。

在这里我不欲详细探讨的是那些在纳粹政权统治期间待在德国的少量汉学家(和后来汉学家)的政治倾向和所起的作用。尽管不是全部，但他们中的一些曾是早期党内成员和纳粹主义的赤裸裸的支持者，<sup>①</sup>因而得到当政者的直接利益。与此相反的是，较有才华的学者被迫移居国外，他们的位置让於那些显露出具备纳粹式学问的适时条件的人。<sup>②</sup>不足为奇的是，战後在移民问题上的沉寂不仅仅是对移民者的冷淡。经过战後早些年代初始但短暂的中止，对牵连的纳粹党成员仍热衷。於是，除了一些总体性的结论外，纳粹分子——主动的或被动的，秘密的或公开的——在单个例子中所扮演的强迫一位同事或学生移民的确切角色，似乎目前难以确定。<sup>③</sup>这一问题当然值得做彻底的档案工作。屈从於纳粹政权显露出与历史撰述问题的关联，以及一些早期学科状况报告，将被一一陈述。

## 二

卫德明關於战後中国研究，较其他学科恢复为慢的看法已被他人所支持。1960年，德意志研究协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试图对西德东方研究和大学中对东方研究最为急迫的需求做综合性的概括。《东方学状况专题报告》的前言——人文学科中的第一个专题报告，紧随那些致力於医学、自然学科和应用学科的报告——陈述道：

1933年後，它（东方学研究）遭到了比别的专业更严重的人员损失，……西德各大学重新开办後的几年以来，（研究工作）一直为战争造成的科研後备人才短缺及大量被破坏的专业和大学图书馆所困扰。<sup>⑭</sup>

在他对於新近出版的傅吾康(Wolfgang Franke)自传的第一卷所做的介绍性评论中，马汉茂(Helmut Martin, 1940-1999)指出，1942年德国东亚研究的工作——那时移民们造成的空缺已得到填补——直到六十年代早期方得到恢复。<sup>⑮</sup>然而，除了卫德明的看法和专题报告的前言中所暗示的蛛丝马迹，移民这件事似乎至少对那些与移民同处一个时代、并对德国中国研究发表状况报告的学者中的一些人来说，成为一个密而不宣的事实。只有艾克斯(Eduard Erkes, 1891-1985)在1948年及福赫伯(Herbert Franke)在1968年认为大多数出色的学者是移民，并且坦率承认德国汉学遭受的损失。<sup>⑯</sup>在傅吾康的总结中我们看到：

1933年後的政治事件使德国汉学遭受极其严重的损失。损失的一部分已无可弥补。纳粹政权将大批学者驱逐出境——在这里，我们祇需提及西蒙(Walter Simon)、科恩(William Cohn)、白乐日(Stefan Balazs)、哈隆(Gustav Haloun)、申得乐(Bruno Schindler)和埃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作为他们的代表。接着军事行动摧毁了一系列重要的图书馆，柏林、莱比锡和格廷根的研究生班，和法兰克福的中国学会(China-Institut)。1945年後的政治分裂使得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巨大的中国图书收藏流散到若干军事区域。<sup>⑰</sup>

据艾克斯所言，学者被放逐和移居国外使得德国汉学的发展在纳粹统治下处於停滞状态。<sup>⑱</sup>

然而，在1937到1968年写就的试图总结德国的中国研究情况的其他文章，几乎完全隐藏了关于移民总体状况的资料，对具体的数据和事例更是绝口不提。<sup>⑲</sup>从近来的这些论述中，不明实情的读者几乎觉察不到表面上持续发展中的德国汉学研究中任何明显的间断。既使德国汉学从1933到1945年所遭受的损失，也许在约二十年後单就从事研究的学者的数目来衡量得到了挽回，但许多那些原本初露才华和战後成为杰出学者的人永远地离开了，这样无意中暗中影响着德国汉学的新传统。迄今为止，惟一对移民问题做出的综合陈述是瓦拉文司(Hartmut Walravens)发表於1990年的一个名单，涵盖了中国、日本、阿尔泰研究及东亚艺术史诸领域。<sup>⑳</sup>这张有四十三个名字的名单——包括图书馆学专家们和一些东亚研究的业馀爱好者——当然证实了瓦拉文司的介绍性言辞：<sup>㉑</sup>

虽然1933年开始的移民使德国的东亚研究受到很严重的挫折，但同时却使德国学者汇集到别的国家，结合着固有的科学传统，他们在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对1937至1968年期间发表的德国学术成就的总结，显露出他们不同背景的迹象，特别是1945年5月这一重要的历史中断而言。在此日期之前，以住在德国的作者不得不考虑一个政治上预想的框架，这一框架与後来显露的框架有根本的不同，後一框架本身也因一篇文章发表於东德抑或西德而不同。在史学撰述上，我们因而需要认清各种修辞上的策略，以及这些文章在学术与政治功用上的不同。那些撰写1933至1945年学科状况报告的学者，包括福兰阁和傅吾康(Otto and Wolfgang Franke)、颜复礼(Fritz Jäger, 1886-1957)和施坦格(Hans O.H. Stange, 1903-1978)。

福兰阁1939年的调查报告，试图成为“1930年以来德国在最宽泛意义上所做的关于汉学的工作的一个简短的提纲”。<sup>②</sup>福兰阁那时已正式退休，<sup>③</sup>他提到了以下学者的工作：魏特夫(Karl Wittfogel, 1896-1988; 1934年移民)、白乐日(Étienne Balazs, 1905-1963, 1935年移民)、<sup>④</sup>勒辛(Ferdinand Lessing, 1935年移民)、<sup>⑤</sup>布林(Anneliese Bulling 1900年生, 1936(?)年移民)、爱伯华(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 1937年移民)、哈隆(Gustav Haloun 1898-1951, 1938年移民)、冯·梅兴-黑尔芬Otto von Maenchen-Helfen (1894-1969, 1933年离开德国去维也纳, 1938年移民)、<sup>⑥</sup>丝毫没提及他们的迁移和新的联系。<sup>⑦</sup>加之，福兰阁提到著名的《泰亚》杂志“不幸于1935年停止发行”，但未告诉读者其原因是杂志的犹太资助者、出版者和编辑申得乐(Bruno Schindler, 1882-1964)1933年移往伦敦(1949年他在伦敦恢复了该杂志)。即使我们假设福兰阁在写报告时也许还没有得到梅兴-黑尔芬移民的消息，也许他不认为埃伯哈德、勒辛、布林和哈隆是政治移民，但他应清楚魏特夫、白乐日及申得乐的情形。

福兰阁将1930年(他进行研究的第一年)看做是海尼士(Haenisch)发表其“汉学”报告的年份。<sup>⑧</sup>福兰阁绝口不提纳粹党员颜复礼的1937年的报告(该报告的英文版出现在《研究与进步》杂志上)，仅仅两年后，就在同一杂志上，福兰阁自己的概述发表了，当然不是偶然的。尽管福兰阁绝非一个政治解放主义者，<sup>⑨</sup>但他也不是一个纳粹分子；他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sup>⑩</sup>与外交部有通道，并在外交部中有一定影响力，得益于他作为出色的中国历史的西方权威而获得的无可争议的荣誉。当颜复礼在其“德国汉学研究现状”中轻易地将移外者的名字丢弃后，福兰阁的报告读起来像是随即的修正：尽管他不能视学者为

“移民”，他仍要将他们纳入“德国汉学”的范围。在这一似乎扑朔迷离的言辞策略中，我们可以认识一个被隐藏在忠诚之内的冲突所撕裂的人性所达到的高度境界。当作为国家保守主义的福兰阁绝不会扮演一个反对其国家的政治领袖的角色，作为学者的福兰阁却不会背叛或忽视该领域的杰出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曾是他自己的学生。

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1940年致力于“德国汉学家的年轻一代”的研究，也提及爱伯华、白乐日、西蒙(1936年移民)、卫德明(当时在北京)、斯泰那恩(Diether von den Steinen, 1903-1954; 1927年后在北京)、艾愕风(Gustav Ecke 1896-1971; 1923年后在中国)，以及老一代的哈隆和勒辛。<sup>⑪</sup>避免“移民”这一标签式的指定，傅吾康陈述道：“这一概述中囊括的德国汉学家不都住在德国，他们发表作品所使用的语言也不总是德语；其中也包括一些主要在德国接受过学科训练和大多在德国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外国汉学家。<sup>⑫</sup>除此而外，他将每位学者的前受雇地注明。在他1945年后所写的若干报告的这头一篇中，如他父亲一般、不是纳粹党员的傅吾康仅仅处于其学术生涯的最初阶段，也出于实用主义的原因，似他父亲一样，选择了这一如实表达但微妙陈述的方法。<sup>⑬</sup>纳粹党成员颜复礼和施坦格所做的考察报告与福兰阁父子所做的不同。<sup>⑭</sup>颜复礼1937年报告的英文版对移民问题秘而不谈。颜复礼以一种无意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态度仅仅提到申得乐的《泰亚》，“表现了一战后德国汉学的巨大发展”，鉴于此，他希望“资助将继续，以保证这一不可或缺的杂志得以不间断发行”。<sup>⑮</sup>(没有提到这一事实：申得乐已移居国外，《泰亚》的发行业已停止。)这个报告的早期德语版发表于1936年，包括了勒辛(那时在伯克利“休假”)、申得乐(与《泰亚》同被提及)和哈隆(那时尚未移民)的名字。<sup>⑯</sup>施坦格在1941年的文章中暗示性地提

到哈隆、埃伯哈德和卫德明——我们注意到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非“雅利安人种”。<sup>⑳</sup>两位作者没有提到在他们自己的写作生涯中任何的学术间断，没有言及离开祖国的学者们，只有提供那时活跃在德国的学者的名字，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欧洲汉学研究史上几乎没有得到哪怕一个注脚。

以上1937、39、40、41年的四个例子显露出一个给德国汉学自己的位置定位的需要——在1930到1937年间，还没有这样的报告出现。理解这一需要至少作为大多数有希望的年轻学者移居国外的直接后果并不太具冒险性。<sup>㉑</sup>这一观点为一份官方报告所证实，这份报告产生於1942年夏天，由柏林的帝国安全中心办公室应慕尼黑的纳粹党中心的要求准备的，它评价了德国和奥地利大学的中国及日本研究的处境。根据从学术界不知名的学者那得来的资料，该报告认识到年轻才华的缺乏，以及在德国的中国、日本研究的“明显的危机”，该危机也许会影响对于目前，以及预想的、远东重大政治变革的理解。<sup>㉒</sup>移民的影响几乎完全被隐瞒起来：根据这份报告，许多年轻学者接受了博物馆的职位，因为东亚研究不能使他们维持生存。“在单个的事例中”，一些人“甚至”离居海外，於是“为德国研究和教育的工作失去了”。<sup>㉓</sup>报告没有提到其背後的政治原因，也未对大批学者事实上是从原职位上被开除有所陈述。在报告中对德国、奥地利大学<sup>㉔</sup>的所有关于中国、日本研究的学者的全面陈述中，没有出现任何移民者的名字。为了强调一本有着明显纳粹倾向的东亚研究的德国杂志的紧迫需要，报告也隐瞒了《泰亚》曾经存在的事实。

就在这一背景中，我们可以注意到颜复礼和施坦格对大多数移民者的意味深长的沉默——由於这一沉默，试图创造一个不间断的、未被破坏的、真实的“德国”汉学图景，这一图景主要由那些留在国内的人组成。但在另一方面，福兰阁父

子明显地试图对抗这一德国学术界狭隘而可怜的场景；而在1939和1940年，他们也都在坚持彼时即将瓦解的学术传统的延续。

1945年後，摆脱了纳粹政权的政治压力的德国汉学家，哪怕是职业历史学家，处於一个十分不幸的、常常不明确的境地，甚至他们被迫要面对他们自己领域内刚刚发生过的历史。当福赫伯——其对移民的态度无可怀疑——为他的老师哈隆写一篇长长的讣告时，关于其移居国外的背景情况他仅仅提了一句：

他1938年11月离开德国去剑桥接受了一个教授的职位，成为自A.C.Moule退休之后空位的继承者。<sup>㉕</sup>

我认为，这句话无意中<sup>㉖</sup>隐瞒的意思多於它表达的意思，并有可能使历史真实模糊化：哈隆自哥廷根到剑桥并不仅仅是一个事业生涯上的阶段。<sup>㉗</sup>我们必须认识到哈隆所做决定的政治及人文含义，以便於能抓住我们在这里所被告知内容的意义。这一言辞使我们想起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件相似的事件。1935年北京的中德文化协会的一份报告<sup>㉘</sup>宣称卫德明於1934年12月辞去协会主席的职位；这一简洁消息背後真相是卫德明的夫人玛丽亚有犹太血统，这一事实成为协会自柏林得到政府资助的潜在障碍。<sup>㉙</sup>1952年，傅吾康又在汉堡发表其就职演讲：《近五十年来中国学的进展》，他也选择从历史视角强调中国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而不触及德国汉学仍旧裸露的创伤。<sup>㉚</sup>在他1960年的文章《德国中国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中，开篇是一个激烈的陈述：仅仅从“历史背景”来看才可以理解“中国研究的现状”。不幸的是，从“历史背景”出发，历史学家福兰阁明晓自其产生之时起的欧洲汉学的整体发展和方法论问题；在印刷密集的二十页文字中，只有一句提及

移民，而即使这一句，事实上也并未针对问题本身。<sup>④</sup>我们如何能将福兰阁1952和1960年的报告与其颇有声望的1940年的文章相联系与调和？

为什么在德国，在艾克斯1948年的较早的评论之後，需要如此多的时间重新得到福赫伯的《德国大学中的汉学》(1968)中清晰明了的语言方式，或得用瓦拉文司的名单(1990)产生首次系统性尝试讨论德国汉学家迁移史，要解释这一点仍然困难。部分的原因是时过境迁，我们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困难：考虑这一移民情况，并在个人传记中所记载的各种各样的动机中捕捉到一个共同的认识。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政治移民的范畴 即使是在1933到1945年间)不总是轻易可以确定的。

试图撰写1933到1945年间德国汉学的迁移史，首先必须有一系列的限定，组成一个概念模式，这一模式可与实际的传记相对照，以便於确定谁应纳入这段历史。但，正是由於传记全是独立的个体单独成篇，一个固定不变的限定不可以施用於移民的每个事例。即使我们试图将我们的概念框架灵活些，關於移民的任何名单都将不是太局限就是太庞杂，或不全面，或其中有些将其作为政治移民则有疑问的人的名字。以下的名单中所包括的人是曾是(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职业中国研究(也包括中国艺术史学家)的学者。包括像斯泰纳恩和艾铿风这样的学者，我们做不到严格确定在1933-1945年离开德国的日期，但应该考虑到一个早些(然而并非晚些)的日期。<sup>⑤</sup>纳入包括卫德明，而不是傅吾康、富克斯(Walter Fuchs, 1902-1979)、奥地利人冯·扎希(Erwin Ritter von Zach, 1872-1942)和其他人，我们必须仔细地考察他们的1945年前的个人背景。(1945年之後一个学者返回德国的事实当然不能影响我们确定他在1945年是否是一个移居国外者。)纳入白乐日，我们应该考虑到在移居前一直在德国工作并发表作品的外国人，和那些看起来事先决定继续

他们在德国的生涯的人。<sup>⑥</sup>(白乐日不仅以德文完成其主要作品，还将他的名字István改为Stefan。)至於傅汉思(Hans Hermann Frankel)和希罗考尔(Conrad Schirokauer)，我们应该包括移居国外後仍选择他们的专业，以及在他们的新国家接受汉学训练者。所有这些不同的背景或许可以作为讨论的主题；比如傅汉思，我们不知道是否他在德国的背景——或在美国的背景——使他选择中国文学作为其兴趣的主要领域。

作为主导原则，我将以下所列的学者归为三组，以期确立起该领域内移居国外者的全景和意义：A)在其领域内经过充分的专业训练，在移居国仍继续其工作的学者；B)离开德国时为中国研究或东亚艺术史的学者，但後未在其专业领域内继续其学术生涯；C)在其学术训练早期便移民，在国外开始其中国研究的生涯。这一领域的业馀者，尽管他们有时做了有意义的贡献，但没有纳入此列，因为并不能指望他们分担某一特定汉学领域的学术责任。<sup>⑦</sup>我也不打算提及在中国工作的传教士们，他们中最为著名的曾是圣言会(SVD)的天主教神父，在天主教辅仁大学担任教授，出版期刊《华裔学志》。他们不是政治或宗教移民，只是完成其在北京的职业任务的个人。最後的概念性问题是關於“中国研究”的定义，严格来讲，就不包括偶尔越界进入中国研究领域的阿尔泰学家和日本学者。尽管学术划分在一定程度上讲是随意的，但作为一种旨在建立领域制度史的方法，接受这些划分似乎是合适的。

### 三

巴赫奥芬(Ludwig Bachhofer, 1894-1976)是一位亚洲艺术史学家，主攻印度和中国研究课题。1921年获博士学位後，他在慕尼黑大学任教至1935年，其间(1922-1926)还担任慕尼黑民族学博物馆工作。(在慕尼黑期间他最为优秀的学生

是勒尔, Max Loehr。)因为他妻子是犹太人, 1933年, 他在慕尼黑大学助教的职位被拒绝。⑤1935年, 他移民去美国, 成为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⑥

白乐日(Etienne Balazs 1905-1963), 原名 Istvan Balazs, 生於布达佩斯。1923年在柏林开始研究, 1925年或1926年去巴黎, 然後回柏林, 并於1930年在柏林获得汉学博士学位。其《唐代经济史》⑦的毕业论文, 他的老师福兰阁认为是他指导过的研究生中最为优秀的, 因为其引进了中国史研究中社会、经济的新视角。1935年他移居法国(1955年入籍)。1940到1945年间, 他和他的夫人在法国南部以务农为生。1950年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後来他协助法国高等实验学院中国研究的发展。在法国, 他的主要出版物是他广泛的翻译著作和发表於1945年的關於《隋书·刑法志》的学术性论著(为此他获得儒莲奖)。除了他的各种主题的文章, ⑧白乐日後来还开创并指导了高度成功的宋代研究课题, 这一课题是在欧洲中国研究中第一个进行国际合作的项目, 其中还包括了日本学者。作为访问学者, 他於1960和1963年在汉堡大学教书。⑨

布林(Anneliese Bulling, 1900-) 在柏林大学学习中国艺术史和考古。1936年获博士学位, 论文为《从汉到唐的中国建筑》。同一年前往英国。1946年, 在伦敦大学做研究学者; 1947到1950年在剑桥大学做研究, 在那里她得到文学硕士学位。1953到1954年, 她在伦敦大学讲学。1956年, 她到了美国(1977年入籍)。1961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从1969年直到1983年退休, 她为艺术史系的助研。⑩

科恩(William Cohn, 1880-1961), 生於柏林, 有犹太血统, 为亚洲艺术史学家, 研究课题广泛, 发表作品的主题不仅仅有关日本、中国和印度, 还有朝鲜和东南亚艺术。⑪他於1904年获

埃尔兰根(Erlangen)大学博士学位, 从1929年直到1933年被逐, 任柏林国家博物馆保管; 1934到1938年, 他任职於柏林的“东亚艺术协会”的秘书。1938年移居英联邦。1946年开始, 他在牛津大学教东亚及印度艺术; 此外, 从1949到1956年, 他组建并领导牛津东亚博物馆, 那是这一领域的第一个英国博物馆。⑫

科恩-维纳(Ernst Cohn-Wiener, 1882-1941), 生於提尔西特的一个犹太家庭, 为艺术史学家。1907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後, 他在柏林大学任讲师, 直至1933年被解聘。其後他移至印度, 被任命为巴罗达州艺术总监。由於健康原因, 他1939年移至美国。他的主要作品发表於1921至1930年间, 包括有东亚、犹太人和中亚伊斯兰艺术。⑬

爱伯华(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开辟了在中国研究中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新领域; 还在德国的时候, 他为汉代天文学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与他的叔叔、天文学家Rolf Müller一起)。当他1933年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已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远东部做了四年(直至1934年)的助手。在他1934到1936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期间, 他曾在北京大学、北平市立大学和保定的医学院讲学。回到德国, 1936到1937年他主持莱比锡的Grassi博物馆亚洲部的工作。1937年, 在特罗特(Adam Von Trott Zu Solz, 1909-1944, 作为反对派成员被处决)⑭的帮助下, 他得到孟德尔松奖学金, 使他能够买一张环世界车票, 访问美国、日本、中国大陆(由於日本入侵去了香港)。这时, 他接到土耳其安卡拉大学的邀请, 1937到1948年在那里任汉语教授。⑮他不仅在土耳其创中国研究之先河, 并从事土耳其语民间文学的工作(如他在汉语方面所做的)。1948年, 安卡拉的聘约没有继续, 拥有一年的洛克菲勒资助, 他移居伯克利, 同年在那里成为一名讲师,

1949年为副教授，1952年为社会学教授，同年入美国籍。1976年自伯克利退休。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其广泛的区域研究不仅到过中国大陆、台湾、韩国和日本，而且到过土耳其(1951-1952)、巴基斯坦和印度(1956-1958和1977)、缅甸(1958)和阿富汗(1960)。曾在法兰克福(1956)、拉合尔(1957-1958)、海德堡(1964)、台湾(1967)、慕尼黑(1979)和柏林(1980)做访问教授。<sup>⑤③</sup>在他1931到1978年的传记中，包括六百三十条书目，其中有六十本专著(包括他的主要作品的几种版本和译本，比如《中国历史》，初版为土耳其文)。<sup>⑤④</sup>他作为教师的影响与作为学者的影响相当：他的许多学生现在成为著名的学者。

艾锷风(Gustav Ecke, 1896-1971)先後在波恩、柏林和埃尔兰根学习，1922年获博士学位，论文是有关梅龙(Charles Meryon)和浪漫主义运动。先後应聘於厦门大学(1923-1928)、清华大学(1928-1933)和辅仁大学(1935-1948)任教授；在北京期间，艾锷风与特罗特保持着紧密的联係和政治的一致性。<sup>⑤⑤</sup>他在中国期间，他也曾在北京中国画院做讲师，并另外在东京、奈良和巴黎做艺术史研究。1949年，他任火奴鲁鲁艺术研究会中国艺术馆保管；以後，他成为夏威夷大学艺术教授。1966年退休後，他在波恩做了两年访问教授。1935年，他是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sup>⑤⑥</sup>的创办者之一。他的作品包括有关中国艺术史和建筑的六本专著以及大约六十篇文章。<sup>⑤⑦</sup>

傅汉思(Hans Hermann Frankel或Fränkel; 1916-2003)先举家迁往英国，後於1935年迁往美国(1942年入籍)。在斯坦福大学(1935-1937)和伯克利(1937-1946)接受教育；1942年，获罗曼语文学博士学位。1942-1945年服兵役，其後在伯克利学汉语(1946-1947)，後在北京大学做拉丁语、德语和西方文学的副教授(1947-1948)。1949到1959年，他在伯克利教授汉语，1959到1961年成为斯

坦福大学的中文助理教授。1961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做中国文学的副教授，1967年提昇为教授。作为访问教授，他曾在汉堡(1964)、波恩(1974)和慕尼黑(1980)任教。其著作文章多关于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sup>⑤⑧</sup>

哈隆(Gustav Haloun 1898-1951) 1922年在莱比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在1926年向布拉格大学提交资格论文：《中国是从何时起知道吐火鲁人和印度日耳曼人》。同年，开始其教学生涯。1927到1930年在哈雷大学，1930年在哥廷根和波恩任教。1931年後，他在哥廷根大学作为不支薪讲师，建立起了汉学图书馆——此类最顶尖的欧洲机构之一(尽管图书馆经战争仍得以保留，但大多图书被撤走，而後在一次灾难中毁掉了)。1938年，他离开哥廷根後，成为剑桥大学中文教授，亦在其新的工作地建起汉学和日本学图书馆；他的努力而带来的卓越成就今天依然十分显著。在他发表的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学术研究中，以缜密的文本校勘方法——正如其在欧洲古典研究中发展的那样——运用到中文文本中。<sup>⑤⑨</sup>

克拉德(Ruth Krader, 1911-1996)曾在汉堡大学(1931)、柏林大学和东方语言讲习班(1933年取得学位证书)，在巴黎的法国东方学语言学校(1933-1934)，後又在汉堡(1934-1935)学习汉语。1935到1938年，她在日内瓦研读政治学。然而，她不得不承认由於“种族”原因，她在德国不再受到欢迎，而且汉堡大学的教授颜复礼，选择了忽略她的存在。<sup>⑥⑩</sup>她1939年移居美国(1946年入籍)；她先在哥伦比亚(1939-1942)，後在耶鲁学习，1946年取得中国研究博士学位。在华盛顿大学，她成为远东图书馆的馆长(1947-1968)，并在1955年获图书馆科学硕士学位。从1968年直到1978年退休，她任华盛顿大学哲学图书馆主任。<sup>⑥⑪</sup>

勒辛(Ferdinand Lessing, 1882-1961)，从

1935年到1950年退休，他是伯克利的东方语言教授(1946年入籍)，当时，他在美国第一个开设有关西藏和蒙古的课程。作为1930-1933年与斯文·赫定一起的中国西北探险队的主要成员，他成为喇嘛教的专家，特别是他关于北京雍和宫庙宇的研究。他还主持了1961年出版的《蒙古语英语词典》。其学术生涯开始于柏林的东方语言研究班，在那里他在1905年得到了他的第一个学位证书(俄语和中文)，并开始于民族学博物馆做助理。他在天津(1907-1909)、青岛(1909-1919)、北京(1919-1921)和瀋阳(1921-1925)待了十八年，做指导和翻译；在北京大学，做德文和梵文教授。1925年，他回到柏林，成为东方语言研究班的中文教授，1927年后，同时，任民族学博物馆东方部的保管，后为负责人。<sup>⑫</sup>

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 1886-1982)，佛教专家，一战后开始其学术生涯，并作为战俘在法国两年。1920年回到柏林，从1928年开始在柏林大学及其他大学对巴利语、梵语、藏语和汉语进行系统研究并开设印度学课程，1933年获弗雷斯劳博士学位，同年，他前往中国，开始其燕京大学中-印学院的助理工作(1934-1935)。1935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梵语、德语讲师。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后，他随北京大学迁往长沙和昆明。从1946到1952年，他再次在北京工作，1952到1960年，他任教于印度Santinilekan的维湿瓦巴拉迪(Visvabharati)大学。后于1960年去耶路撒冷做访问教授，也去了巴黎(1960-1961)。最后，他在杜宾根成为荣誉教授，1964到1967年期间在那里教书。<sup>⑬</sup>

罗文达(Rudolf Loewenthal或Löwenthal, 1904-1996)，1933年在柏林大学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1934到1947年成为燕京大学新闻学讲师。他还与在北京的德国汉学家联络，为他们提供俄国的学术翻译资料。<sup>⑭</sup>1947年，他移往美国

(1957年入籍)，在康奈尔大学做助教及副研究员(1947-1953)。后成为佐治敦大学的讲师(1953-1959)，后离开学术界进入工业公司。他撰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出版发展的著作，特别是关于宗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的)期刊，并发表了关于中国犹太人的丰硕著作。此外，他发表了俄罗斯-伊斯兰和中国-伊斯兰研究成果，编写书目，准备俄文学学术成就的翻译，并撰写各种中亚主题的文章。<sup>⑮</sup>

黑尔芬(Otto John Maenchen-Helfen或Otto Mänchen-Helfen; 1894-1969)，<sup>⑯</sup>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23年由于《山海经》的研究获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他一直作为一名维也纳的独立学者，直到1927年，他到莫斯科，领导马恩学院的社会-人类学分支。1929年，他担任了前苏联中亚地区及蒙古西北、尼泊尔、克什米尔、阿富汗的考古考察。1930到1933年，他居于柏林并取得任职资格；1933年，当被要求参加纳粹讲师协会时，他拒绝了一个教职，回到维也纳。1938年，第二次取得任职资格后，他开始在大学做不支薪讲师。同年，奥德的结盟又一次迫其离开，前往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米尔斯学院，先为访问讲师(1939年开始)，后为东方学教授(1942-1947)。从1947年到退休的1962年，他先后为伯克利大学的讲师(1947-1948)和艺术史教授。1962年始，他成为《中亚杂志》的合作编辑。其最为著名的著作是关于匈奴人和其他欧亚民族；其未完成巨著《匈奴人的世界》，在他去世后于1973年出版。他对于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够读并流利地说拉丁语、希腊语、罗马语族的语言、德语、英语、俄语，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中文、日文、蒙古语和匈牙利语)，再结合其在艺术史上的广博知识和考古记载，使他能在此较广泛的范围内汲取资料。<sup>⑰</sup>

梅谷(Franz Michael, 1907-1992)1928到1930年，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在柏林东方语言

研究班学习中文。1930年获得学位证书後，他去弗赖堡大学学习政治科学及法律；在那里，他於1933年获得法学博士。同时，他在巴登行政机构任区域检察官和法官(1931-1933)。尽管1933年被德国外国行政处任命为专员，他还是因犹太血统被解雇，同年移居中国。1934到1938年，他任教于国立浙江大学(日本侵入期间随校迁入内地)；1938年，前往美国(1944年入籍)，成为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助理。1942年，他被委任在华盛顿大学设立美国军队亚洲语言课程，在那里又成为远东历史和政府助教，1943年为副教授，1946年成为教授。从1947到1962年，他任远东及俄罗斯学院助理主任，後为执行主任，还担任当代中国历史课题的负责人。1964年，他去了华盛顿(D.C.)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作为中国史和政府教授，他任中国-苏联研究学院副主任，後为学院及国家防御教育中心主任(1969-1972)。从1972到1977年退休，他为历史学及国际事务教授，并任当代中国及亚洲研究主任。他的早期著作是关于中国封建帝国後期政治史(《中国满族统治的起源》)；後期在致力於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前，他与人合写了三卷本的《太平天国起义：历史及资料》。<sup>⑧</sup>

米什(John Mish, 1909-1983)，生於俾斯麦呼特(Bismarckhütte)，原名Johannes Misch，在布雷斯劳(Breslau)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和法律，1931年始，在柏林大学的东方语言研究班学习汉学和满语。1934年，因主修满语研究及提交的一篇语言学论文，获汉学博士学位。从1934到1939年，他在华沙东方学院任教。後在巴哥达(Baghdad)的马卡兹亚(Markaziyah)学院教授德语和英语(1940-1941)，并任孟买的印度政府对华情报人员(1941-1946)。1946年，他任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分部主任，建立了一个出色的东亚研究资料基地。1955年始，他同时任斯拉夫语分部主任；他於1978年退休。作为满语专家，他还接受

了亚洲学院(1946-1951)等高等学院的学术职位。<sup>⑨</sup>

芒斯特伯格(Hug Munsterberg或Münsterberg; 1916-1995)，父亲为德国人，<sup>⑩</sup>母亲为美国人，1935年到美国，在哈佛大学1938年获学士学位，1942年获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整理为《中国佛教铜器》，为其撰写的二十五本著作之一。他先是在威尔斯利(Wellesley)学院任艺术史讲师(1941-1942)，後入伍四年。1946到1952年，他成为密执根大学艺术史副教授，後为教授。1952到1956年，在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任艺术史教授。接着在纽约Hunter学院任艺术史讲师，後成为纽约州立大学艺术史教授。1979年退休後，在巴尔德(Bard)学院及帕森斯(Parsons)设计学校任访问教授，一直到1991年。<sup>⑪</sup>

赖弗勒(Erwin Reifler, 1903-1965)，奥地利维也纳人，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汉语，1927-1928年任柏林的欧洲中国通讯社编辑。1931年因其《古代中国国家与行政》的论文获维也纳大学的政治学学位，後於1932年前往上海，最初作为商人。在那里他成为奥地利政府国家联盟顾问的助理(1932)，後成为交通大学德语教授(1932-1937)。日本人入侵後，他去香港教授中文和德文(1938-1940)；後回到上海，成为国家医学院(1940-1941)和中法大学(1941-1942)的德语拉丁语教授。因其岳父为犹太教士，赖弗勒与上海犹太组织关系密切。1943到1947年，他任法国天主教L'Aurore大学的汉学教授。1947年，他去美国旅游，在魏特夫的帮助下，在华盛顿大学远东和俄罗斯系任中文语言的访问教授职位(1947)，後於1948年为副教授，1955年为教授。他关注於语言学，主要是符号学问题，并从事一项自动翻译课题。此外，广泛地研究各文明中的古代度量系统。<sup>⑫</sup>

萨里莫尼(Alfred Salmony 1890-1958)在波

恩(1912-1914)和维也纳(1919-1920)学习艺术史和考古,并以《欧洲和东亚的雕塑比较》的毕业论文获波恩的博士学位。1920到1924年,他任科隆的东方艺术博物馆馆长,1925到1933年任该馆副馆长。同时,他在科隆大学讲学并任《亚洲艺术》的合作编辑(1924-1933;1946年后为主编)1926年,他组织了亚洲艺术科隆展览。研究及讲学行程中有美国(1926-1927,1932-1933)、前苏联(1928-1934)、中国和日本(1929-1930)。1933年他前往法国,在那里他加入巴黎Citroen和Cernuschi博物馆。1934年3月离法前往美国,于1934到1937年在加利福尼亚密尔学院任美术讲师。1937年曾在华盛顿大学因讲学做短暂停留,后去了纽约大学美术学院,任讲师(1938-1947;1938-1941)同时任Vassar学院讲师;1944年曾在威尔斯利学院任副教授(1947-1953)和教授(1953年后)。其十一部专著及大量论文涉及有关亚洲文化的多方面,特别是中国艺术:绘画、玉器、雕塑、铜器、墓葬陪葬品、陶瓷等。他的大量藏书,包括最为重要的关于俄国艺术与考古学术成果收藏,现在保留在美术学院的阿尔弗烈德·萨蒙涅(Alfred Salmony)亚洲研究纪念图书馆中。<sup>⑧</sup>

申得乐Bruno Schindler(1882-1964),为莱比锡的犹太出版者,最初编辑出版《泰亚》(从1923年开始),该杂志作为亚洲研究期刊,很快成为德国中亚、东亚和东南亚研究的最重要的期刊。从最开始,连同《夏德周年纪念卷》,杂志多半为英文版,并成为国际性期刊。申得乐曾在柏林和布雷斯劳学习历史和政治法规与宪法。1907到1910年,他在各英文图书馆工作,并成为东方学家加斯特(M. Gaster)的秘书。1912年,他到中国,考察开封、上海的中国犹太人问题,帮助组织犹太集团。一战前,他回到德国;1919年,向莱比锡大学提交论文《古代中国的神职人员阶层》。除《泰亚》外,他还作为其他几种中亚学杂志的合作创立者。1933年,

他移往英国,这使得《泰亚》骤然停刊。在英国,他和他的妻子共同创建并主持为犹太孩子而设的摄政公园学校。1936年,他加盟泰勒外国出版社,1939年进入隆德·汉弗莱书屋。《泰亚》最初是作为对夏德的贡献,1949年,申得乐的《泰亚》在英国复刊,复刊第一期献给马伯乐。<sup>⑨</sup>除了期刊,他还负责许多在隆德·汉弗莱的关于东方学及斯拉夫语研究的著作的出版。<sup>⑩</sup>

希罗考尔(Conrad Max Schirokauer 1929-) 1939年随其全家经由意大利移往美国。在美国耶鲁大学(学士,1952)和斯坦福大学(硕士,1952;博士,1960)接受大学教育。1960到1962年,他在斯瓦特茅(Swarthmore)学院教授历史,后成为纽约城市大学历史学助教(1962)、副教授(1970)、教授(1977)。其研究主要为宋代道学。<sup>⑪</sup>

施瓦茨(Ernst Schwarz 1916-2003)作为犹太学生于1938年由维也纳移往上海,在上海他开始学习中文,工作则主要是当体育教练。日本人投降后,他于1945年秋迁往南京,在国家图书馆工作,住在佛寺中,供职于教育部做秘书,并在金陵大学1946年秋自成都移回后,在外语系教书。<sup>⑫</sup>1947到1950年,他在南京奥地利外交部任秘书,后在中国外文出版社做翻译。他于1958到1960年在杭州大学教授英国语言文学,1960年前往德国民主共和国。1961到1969年,他为研究助理,1969到1970年,他在柏林洪堡大学任讲师,在那里,他于1965年获博士学位。在1973-1974,1975-1976,1981,1988年,他在维也纳外交研究院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讲座。其著作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与诗歌的翻译。<sup>⑬</sup>

西蒙(Ernst Julius Walter Simon, 1893-1981),生在一个犹太家庭,1911到1914年在柏林大学研究罗马语族和古典语文学。1915到1918年在德国军队服兵役后,1919年获博士学位,次年得到图书馆学学位。1921到1922年,他任职于基

尔大学图书馆，之後回到柏林大学做馆员，直至1935年被解职。拿到博士学位後不久，他开始在福兰阁的指导下学习汉学及几门亚洲语言。1926年始，他一面在柏林大学作为不支薪讲师教授远东语言学，一面为从1930年作为特殊的汉学教授；他还是《东方学文学报》的合作编辑。1932到1933年，他作为交换馆员前往北京国家图书馆。1934年，他的讲学资格被取消，第二年被解职；1936年，他移往英国，成为伦敦大学教员(1936-1960)。1936年始，他在亚非学院先作为讲师开课，从1947年始为中文、日文、藏文和满文教授。退休後，他作为访问教授在多伦多大学(1961-1962)、堪培拉大学(1962, 1970)、东京大学、墨尔本(1970)大学教书。1964年始，他任《泰亚》编辑委员会主席，1965到1975年，任《泰亚》编辑。在其著作及文章中，其专长为中文及藏文语言学。<sup>89</sup>

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 1911-1999)，1933年移往法国之前，与福兰阁在柏林学习。在巴黎，他在巴黎法国东方语言学校、法国国立高等学院和法兰西学院继续其中文、日文和藏文研究。1939年他入法国籍，不久後被动员迁往印度支那。他在军中做中文及日文翻译。作为法国东方语言学校的一员，他的薪水被维希政府取消了；1946年他恢复原职。同年，他去了中国，在北京待了三年，继续其西藏、蒙古和汉藏交界土著文化的研究。1949年，他成为巴黎法国东方语言学校的中文教授，1951年在法国国立高等学院第五部获得一个职位，在那里他工作至1974年；同时，1966年他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他在法国高等学术研究机构的工作和其大量的著作书目展现了其在西藏语言和文化、藏传佛教、民间宗教、密教、道教和中国宇宙论研究的独特专长。

<sup>90</sup>

斯泰纳恩(Diether von den Steinen, 1903-

1954)<sup>91</sup>至早在1927年离开德国到中国，此前一年在德国完成其学位论文。他先後在中山大学(1927-1929)、清华大学(1929-1936)和德中学会(1937)长沙分部教书。1938年，他到伯克利任东方语言讲师，1940年成为中日图书馆保管。他因其关于曹操诗歌的重要文章闻名。<sup>92</sup>

维思(Ilza Veith 1915-)1937年移往美国之前(1945年入籍)在日内瓦和维也纳(1934-1936)的医学校学习。她於1944年在霍普金斯大学获硕士学位，1947年获博士学位(学位论文《关于黄帝内经》)。在东京顺天堂大学医学院，她於1975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47到1957年，她在华盛顿军事医学图书馆任东方医学顾问；她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医学史讲师(1949)、副教授(1953)和教授(1957-1963)。1963年，她在门宁格精神病学学校任访问教授，并从1964年到退休的1979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弗兰西斯科医学中心为医学史教授和副主席；同时，她还任精神病学史教授(1967-1979)。她还专门研究中国医学史及其古典著作。<sup>93</sup>

卫德明(Helmut Wilhelm 1905-1990)生於青岛，为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之子。一战後，他在法兰克福新建立的中国研究院协助其父亲。1928年，他通过了联邦法律考试，然後决定继承其父的工作。1932年，他在柏林大学获汉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从师於福兰阁，学位论文有关顾炎武。1933年，他离开德国，1933到1937年为讲师，几年的独立研究後，1946到1948年为国立北京大学的德国语言与文学教授。在北京的头一年，他还初任中德文化协会(后来的中德学会)的指导。<sup>94</sup>他给德国组织做的演讲奠定了他後来一些著作的基础，其中包括《易经八论》——流传最广的《易经》入门本。在北京时，华盛顿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职位，在那里他先後於1948年为中国历史讲师，1950年为副教授，1953年任教授。至

1971年退休，一直任有教职。他於1951至1967年所做的一系列演讲，发表在《易经 中的天、地、人》一书中。尽管卫德明的教学及发表的论述涉及了中国文史领域内极为宽泛的课题（除了他的几本书，他发表了大约一百篇文章和八十多篇评论），他关于《易经》的著作确定了其学术中心。在这些著作中，他还继承了他父亲的学术精华。许多主要从卫德明处得到汉学教育的杰出学者证明了他做为一名教师的重要性。

魏特夫(魏复光 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 在莱比锡、柏林等地的大学学习汉学(1921年开始於莱比锡) 历史、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地理。他於1928年在经济史学家古伦伯格(Carl Grunberg)的指导下，自法兰克福大学得到博士学位，论文是《农业以及工业生产力的经济意义》，该论文成为他1931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第一章。1920年，他参加了德国共产党，1939年仍是其中一员，那时，希特勒—斯大林公约後，他与共产主义绝裂。1925年，加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学院。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兴趣可追溯到1919年在柏林所做的六次公开演讲；他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於1926年出版(《觉醒的中国》)。在德国，他的许多关于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的文章(特别是1926到1928年)不过占有其著作的一部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发表了大量攻击希特勒及其政党的作品。1933年3月，在他试图离开德国时被捕。在一些监狱和早期的集中营中度过岁月，後於1933年因国际社会的抗议和请愿而获释放，去了英国，後去了美国。1934到1939年，他在纽约的社会研究国际学院(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学院的后身)工作，同时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太平洋关系学院；1935到1937年，参与一个前往中国的研究旅程，1939-1947年，他成为中国历史研究课题的指导，定居於哥伦比亚大学。1947年，他被华盛顿大学任命为中国历史教授，

但只有有限的教学任务，还可以允许他继续其在哥伦比亚的研究。他在1957年的傑作《东方专制主义》，对所谓东方“液力社会”和其在苏联政治结构中相对应者进行分析，十分有影响。<sup>①6</sup>1966年，他从华盛顿大学退休。

沃尔夫(Ernst Wolff 1910-) 生在天津一个德国犹太裔家庭。1928年，他开始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在东方语言研究班(1930年拿到学位证书)学习汉语。1933年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後，他在柏林的法院工作，但因其犹太背景，被公共服务部门解雇。他回到天津，1936年加入在唐山和天津的南开矿物公司，直到1951年，起初在英国人手下，後在中国人领导下。1951年，他经香港到东京，在东京待至1959年，这时梅谷帮助他加入华盛顿大学。在那里，他开始在远东和斯拉夫语系(1960)做研究指导，并在东亚图书馆作克拉德的助理。1962年，他得到图书馆学硕士学位，1966年得到中国文学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周作人的。1965年起，作为高级图书馆馆员，他在伊利诺斯大学建立了亚洲图书馆。1978年退休後，居住在西雅图。<sup>①7</sup>

#### 四

至1968年，离开德国的汉学家与那些仍旧留在德国的汉学家，最终还是决裂了。福赫伯在其《德国大学的汉学研究》有限的篇幅中，仅仅局限於这一领域最为重要的出版物，对几乎所有移外者的著作绝口不提。尽管他纳入了只要在德国大学工作过的以别种文字而非德语写作的作品，移外者的学术仍依照另一种标准衡量：

對於那些以前曾在德国工作而今在国外仍然活跃的学者，我们仅仅选择那些在德国出版的作品。

<sup>①8</sup>

这是一种过於实用主义的折衷，而且甚至在福赫伯总论的标题中没有强加限定。（另外，为什么包括用德文写的，而不是在德国大学里写的？）关于界线这一敏感问题，对战後二十年来“德国”汉学的一种新的反省来说十分重要。

在从最初“德国”汉学和移外者学术成就界线的不确定到最终显而易见的分界这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人文学科内使得这一学术领域与其他学术领域绝然分离的现象：二战後的再移民问题。目前关于1933到1945年间德国移民的最详尽全面的资料是《1933-1945年中欧移居国外者传记大辞典》，这是由慕尼黑现代史学院和纽约犹太移民研究基金会共同研究编撰的。关于科学和人文学科，该辞典将入选人员基本上限于拥有教授职位或杰出的研究者，即科学与学术精英。这样，它纳入了约2400到2500人，绝大多数是“全职”教授。与1930到1931冬季学期德国大学教授数量（总数4482人、其中2741位是全职的）做一比较，立刻可知移居国外者作为一个整体对德国学术界意味着什麼。无疑地，在德国移民中，学术精英多得不成比例。<sup>④</sup>

1984年，《辞典》编撰项目的主持学者穆勒（Horst Möller），将注意力放在以往被忽视的再移民现象。提及所有文化及科学的移外者，但仅仅考虑那些在1908年（在德国）和1913年（在奥地利或捷克）前出生的移外者——那是移外前已得到其专业社会地位、并在1948年仍然活着的人。穆勒注意到他们中几乎三分之一回到德国。他们中间，近27%主要是人文学科领域的学者。<sup>⑤</sup>审视这些数字，中国研究和东亚艺术史研究在人文学科领域内与总体情势有极大的不同。艾克斯在1948年的期望——一些移居国外者会回来<sup>⑥</sup>——没有实现。在所有在1945年前移居国外的学者当中，惟一的在其活跃期间回来的（其实，他将开始其学术生涯）是施瓦茨，他於1960年离开中国

加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李华德和艾克只是在正式退休後才回到杜宾根和波恩。而且，在以上提到的所有汉学家和艺术史家中，只有白乐日、爱伯华和傅汉思不定期地作为访问学者回德国。

有三个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在我们领域中的移居外国者当中，许多都算是当时最具创造力的学者，这一局势在许多领域内都十分典型，如社会科学、政治科学和心理学，<sup>⑦</sup>还有艺术史或音乐学。这样，中国研究领域内大量创造潜力从德国移往美国。魏特夫和爱伯华的名字可以在这里做为典型的例子。当他们和其他人离开他们的老师和同事，他们发现国外，主要在美国，有更为有利的条件来发展其新的兴趣点和学术研究方法。

第二个因素是大多数移居国外者，勒辛和西蒙除外，是在移居後或移动中首次得到教授职位的任命。这一情势，与囊括了许多傑出教授的人文学科中的其他领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中国研究作为一块年轻的领域，刚刚经历过其首次主要的更新换代：卫德明1930年去世，接着主要学者福兰阁、佛尔克（Alfred Forkel, 1867-1944）和纳色恩（Arthur Von Rosthorn, 1862-1945）退休。而其他领域的教授们也许仍然能感受到与他们以前所属的机构和同事有密切的联系——并且也许接到更多的劝其回国的邀请——我们可以考虑到，年轻学者，对他们来讲，政治移民是其生涯中最富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不大可能在战後重新迁移。

第三个可资解释回移稀少的因素，是德语环境也许对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相对其他领域来讲比较不重要。

以上三个因素值得进一步考虑，因为它们不只是对理解在德国的中国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至关重要。比如我们可以问，二战後有什么机会发展广泛范围内的国际合作，比在最近二十年里早许

多。战後的形势看来确有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德国学者在伦敦、巴黎和美国各地的主要研究部门找到新位置，将他们的方法和专业引进这些机构中，并发现而利用发展其工作的新机会。当然，也产生深的裂隙。在某些情形下，德国的前纳粹积极分子们直接填补了比他们能力强的移居国外的同事的实际或候选席位，可以想像那些被迫放逐者与日俱增的痛苦——期待得到一个职位。在对战後早期德国汉学所做的分析性评价中，我们需要确切的资料，来说明关于呼唤学者回到德国大学的学术领导职位上所实际做出的审慎的努力，以及为什么这些努力总是失败——如果这些努力有案可查的话。①就目前来讲，我们不能考察到我们的历史的内向的一面。这一历史当然非常有个性，但最终与德国学术界当时的制度有关联。当然在这一语境中，我们不应忘记即使曾是冲锋队的施坦格，在一段时间被迫的中断後，1953年得到哥廷根大学的教授职位②而使其增色，而没有提及在他那段作为一般党员的往事。

原则上讲，是否移居国外本身并不能成为褒贬学者的标准，我们听说过永久关系，甚至越过这一边缘的友谊，也许可以作为进行更多合作的基础。欧洲汉学国际合作的第一个主要计划“宋代研究”——为移民白乐日发起。我想到即使在今天，一份关于德国汉学的状况报告应考虑德国中国研究战后所失去的机会。

因为与我们的现状有直接的关系，语言环境问题成为一个微妙的问题，它在移外者决定是否回到故地起了作用。在我们的领域中，英语成为惟一的西方通用语没有多少疑问。在以往的二十年中，英语的重要性通过各方面的强力冲击被加强了，这些冲击包括在美国的年轻学者数量的增加，其中有许多中国人，他们与法国或德国汉学没有学术上的关联；另外，在欧洲英语地位抬

升，而且，英语通行的香港作为中国和西方的中间地带的重要性使其地位上升，都是原因之一。

然而，尽管英语成为通用语言所带来的多种冲击的结合，我们不应忘记六十年前德国学者的移居国外如何大幅度地削减了已往德语在东亚研究中的重要性。当我们在检讨以上所列移外者的编年传记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傑出的学者离开的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上的地区，而且在教学及写作中他们丢掉了他们已往的语言。自从那决定性的时刻，德国汉学在其发展中仍然占据首始的地位，它失去了一个在教师和人才组成上的“临界质量”来平衡这一严重的损失。结果是，在移外用英语（一小部分用法语）发表的作品和同时德语作品的数量及总体学术意义之间没有可比性。当然这一观察并不意味着贬抑那些用德文写就的傑出的作品，比如福兰阁的代表作《中华帝国史》但它表明在它们发表时，从国际眼光来看，就其自己的语言环境及语言优势上，相对来说减弱了，相反地却遭受移外者的著作强大不可预料的英文文体的日益增长的压力。於是，这一历史转折所带来的十足冲击，通过移居国外者的学生们工作的增加，得到继续发展。

谈到1933到1945年导致的对德国汉学的持续後果，应该记住的是，无论从德国角度出发来看损失是什么，中国研究在接纳移民的机构中——特别在美国，也在英国和法国——有巨大的收获。考虑到移民在放逐国的冲击，中国研究的提高可与人文学科内的其他领域，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政治科学等量齐观。二战後美国汉学的大发展与移居国外者的努力分不开，他们也因此得到在宜人的环境中发挥他们创造力的新的机会。而且，因为移民有了一个新环境，他们的学术水平也受到挑战，被新的动力所激，他们现在已对适应这种环境游刃有余。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像白乐日或乔治·肯尼迪

(George A. Kennedy, 1901-1960) 这样的外国学生去柏林和其他德国大学接受汉学教育。1933年後，是老师们自己离开，去寻找他们在国外的学生。今天，从事中国研究的德国学生可以在莱顿、巴黎、伦敦和剑桥，北美大学里找到，有时已临近他们自己失去的传统。

(作者注：本文的基础是为1997年10月24-26日在柏林举办的德国中国研究学会第八次年会提交的论文。原文发表于《美国东方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8卷507-529页)

### 注 释

《远东季刊》1949年第8期，319-322页。

此“恢复永久公民服务法例”用来作为剥夺所有被认为是“非雅利安人”、尤其是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服务(包括大学)的正式纲领；判定是否为犹太人的一条充足的标准是，例如，祖父或祖母属于犹太团体。法例亦用於驱逐政治上的反对者。

福赫伯《汉学》(伯尔尼：A. Francke, 1953), 10页。

首席教授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

首席教授高延(J. J. M. de Groot, 1854-1921)。

首席教授孔拉迪(August Conrady, 1864-1925)。

首席教授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见福赫伯《德国大学中的汉学》(威斯巴登：Franz Steiner 1968) 11-12页，46页，关于1942年形势概观，见官方《帝国部委1942年关于汉学及日本学在德国的现状报告》，在《妇女与中国短讯》1994年第7期(1-17页)重印并加了解。

在美国，见Laura Fermi《著名的移民：1930-1941年欧洲的知识分子处境》2版(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1) 352-357页各处；在英国，见Norman Bentwich《逃亡学者的营救与成就：1933-1952年失去家园的学者和科学家们的故事》(海牙：Martinus Nijhoff, 1953) 70页，87页各处。对知识移民于英国的意义的概括评估见J. M. Ritchie的《逃离纳粹主义的德国难民》，收入Panikos Panayi编《1500年来在英国的德国人》(伦敦：Hambleton出版社，1996年)，147-170页。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的移民当然是1933-1945年整体知识分子移民的一部分，移民在新居地的工作常常与别的学术领域的同事相关联。关于艺术史的状况，见Fermi书247-253页及Colin Eisler《艺术史的美国风格：关于移民的研究》，收入Donald

Fleming和Bernard Bailyn编《知识移民：欧洲和美国，1930-1960》(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 544-629页。

应当注意，这一形势并非代表了所有德国学术界，甚至东亚研究学界。在纳粹政权下日本研究的陈述，见Herbert Worm《纳粹时期的日本学》，收入Gerhard Krebs和Bernd Martin编《柏林-东京轴心的形成及衰败》(慕尼黑：Iudicium, 1994) 153-186页。关于中国研究的第一个且最近的途径由Roland Felber着手做，《适应与反抗之间：纳粹时期东亚学学者的命运》，《柏林中国期刊》1996年第10期，80-86页。正如题目所示，Felber的论述包括对相对来讲较少数量的人数的注解，其价值在作者使用了洪堡大学和其他机构的档案材料。

① 关于纳粹党员，见《帝国部委报告》中提供的材料。惟一未献媚于纳粹而得以保持其职位的汉学教授是海尼士(1880-1966)。他在1932-1945年，供职于柏林大学，于正常年龄退休；在该时期内，他得以使自己和他的研究班坚决地远离纳粹党。在1944年，他曾独自吁请德国当权者释放其法国同事马伯乐(1883-1945)；马伯乐最后于1945年3月17日在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死去。所有的海尼士请求支持其吁请的德国汉学家拒绝了他的请求；见福赫伯《慕尼黑之汉学：回顾与展望》见《慕尼黑大学1967-1968年大事记》(慕尼黑：大学出版社，1970) 113页。据傅吾康为富克斯(Walter Fuchs)写的讣告，《远东》，1980年27期，148页)，海尼士是战争结束伊始西东亚研究学者中惟一在政治上不玷污的学者。他在纳粹政权下的尊贵行为，见Erika Taube《海尼士：刚正不阿一例》，见Ralf Moritz编《新研究中的汉学传统形象》(莱比锡：莱比锡大学出版社，1993)，179-189页。海尼士亲自为马伯乐在《德国东方研究会会刊》101期，1951年，1-2页)上撰写讣告。

② 关于这个问题，参看Felber的《适应与反抗之间》及《帝国部委报告》1-17页，后一来源无疑表明一个明显的学术界的纳粹倾向曾是评价的明确准则。

③ 于是瓦拉文司关于克拉德(Ruth Krader, 1911-1996)的移居国外所做的确切的论据十分宝贵。见下。

④ Adam Falkenstein编《东方学状况备忘录》(威斯巴登：Franz Steiner, 1960), 2。

⑤ 马汉茂《裂痕与夷平的努力》，收入傅吾康《中国之魅力：一位汉学家的自传(1912-1950)》(多特蒙德：project Verlag, 1995)。

⑥ 艾克斯，《德国汉学的文化政治涵义》，《地球》1948：38-40页。文章发表时，他刚刚任莱比锡的教授，回到1933年被纳粹驱逐的研究班；见Johannes Schubert，《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的东亚系：传统与展望》，《民族解放战争与新殖民主义》柏林：学术出

出版社，1962，412-413页；曾任慕尼黑大学教授的福赫伯《德国大学中的汉学》，30页。

⑮ 福赫伯《德国大学中的汉学》，30页。在他早期的纯专业性的文章《德国的远东研究》中，《亚洲研究》1959年18期，535-540页，他未对移外者及其后果提及一言，将此情况排除出任何历史背景外。

⑯ 艾克斯《德国汉学的文化政治涵义》，39页。

⑰ 1937年，首批关于中国研究的德文总结在纳粹政权下出现。我选择1968年作为人为的终点，因为它标志着福赫伯上面提到的专论的出现。并且，那些离开德国的、作为著名学者的移民中的多数人的学术生涯在那时也已结束或接近终点。除了以上提到的报告，我还注意到以下的总结：颜复礼用英文写的《德国的汉学研究现状》，《研究与进步》1937年第3期，96-99页（德语版：《德国汉学现状》，《东亚环顾》1936年17期，561-563页；）福兰阁，《德国汉学》，《研究与进步》1939年第5期，257-267页。（德文版：《汉学在德国》，《研究与进步》1939年第15期，85-88页）；傅吾康，《德国汉学家的年轻一代》，《华裔学志》1940年，第5期，437-446页；施坦格（Hans O.H.Stange）《德国汉学》，《人民生活中的德国文化》1941年第16期，49-56页；傅吾康《近五十年来汉学之发展》，《东亚自然与人类协会通讯》1952年第72期，8-18页；傅吾康，《德国中国研究的问题与现状》，《现代世界》1960年第1期，409-429页，又见傅吾康《中国——马来西亚：题明清史和东南亚的海外中国人的论文选编：1942-1988》（新加坡：南海社会，1989），546-566页。另一个重要文献是上面提到的《帝国部委1942年关于汉学及日本学在德国的现状报告》，除了上面提到的Schubert关于莱比锡的报告，单个机构的文章包括：海尼士，《东亚学研究在慕尼黑的创建》，《德意志东方学会学报》103（1953），45-48；傅吾康和Oscar Benl，《东亚学在汉堡的创建》，《德意志东方学会学报》104（1954），15-20页；海尼士《1889至1945年间柏林大学的汉学综述》，《关于科学问题及柏林大学历史的文章及论著》，Hans Leussing编（柏林：Walter de Gruyter，1960），554-566页。

⑱ 瓦拉文司（Hartmut Walravens），《1933-1945年间德国的东亚学及其流亡》，见《书目及报告》，瓦拉文司编（慕尼黑：K.G.Saur，1990），231-241页。

⑲ 同上，231-232页。

⑳ 福兰阁，《德国汉学》，257页注。仅在德文版中，这一注释后有“在于提到及不提到的著作中不存在任何偏见，那些德国人在他国或以其他语言发表的文章作品，及与那些非德国人而用德文发表的著作，因节省空间的需要不能提到”。对“节省空间”一词值得认真对待：在该文章的同一页，福兰阁提到了Hans Praesent定期在莱

比锡德国图书馆做的关于东亚研究的作品目录，并发表在《东亚环顾》上。福兰阁指出，从1933年起的许多杂志“出于节省空间之原因”被清除出该目录，（福兰阁已使用引号）。当福兰阁在他自己的陈述中使用同样的方式，我们可在字里行间明白他事实上希望说：“德国人在他国……和非德国人的作品定在考虑之外，不是出自他的愿望”。

㉑ 1909年，福兰阁在汉堡殖民研究所的汉学研究中授予首席职位，直至1923年。1919年，东亚研究班合并入新近成立的汉堡大学；见《汉堡东亚研究的创建》，15-16页。1923至1931年退休，福兰阁有柏林的教职；见海尼士《1889-1945年间柏林大学的汉学》559-561页。他的自传在其去世后出版，名为《来自两个世界的回忆》（柏林：Walter de Gruyter，1954）；其讣告出现在福赫伯的《汉学》22页，注1。

㉒ 福兰阁，《德国汉学》，259页提到他为白乐日1905年生於布达佩斯，名István Balázs，后用德语、法语名字的形式，不用匈牙利的发音。

㉓ 福兰阁文章发表时，非常清楚勒辛实际已移往美国。1935年，他授予了伯克利的东方语言文学Agassiz职席，经政府允许，教育部发布指令，他离开德国，“休假”达三年之久（见《东亚环顾》1935年16期：304页）。1938年，柏林大学重新任命他为藏语、蒙古语、中国佛教教师（见《东亚环顾》1938年19期：333页）——他没有响应这一召唤。

㉔ 福兰阁，《德国汉学》，259页。1938年移往美国后，梅兴-黑尔芬München Helfen将其姓名英文化为Maenchen-Helfen（有时仅仅是Maenchen），并加入一个中间的缩写J.代表Johann，1959年后他使用英语形式John；见Charles King《匈奴人和中亚：Otto J.Maenchen-Helfen的书目》，《中亚杂志》1996年40期，178页注2。

㉕ 参见注22所引福兰阁的陈述。

㉖ 见哈隆缩编《德国科学50年：各专业领域的发展》（柏林：Walter de Gruyter，1930），262-274页。

㉗ 其自传《来自两个世界的回忆》的编辑，福兰阁的两个孩子Olga和Wolfgang，注意到他们忽略了“今天可能引起误解的政治假象。在最后的章节中，偶然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突然的意变是由于这些删改”。最后章节主要针对纳粹的年份，关于福兰阁的“国家保守主义”政治倾向，见傅吾康《中国之魅力》（11-12页）和福兰阁在其自传中自己的证明。

㉘ 见《中国之魅力》，66页，80-81、96、111页。

㉙ 傅吾康那时在北京中德学会工作（见下注45）；见其自传《中国之魅力》93-110页。

㉚ 傅吾康，《德国汉学家的年轻一代》437页，注2。我不能确认他打算将什么人纳入“外国学者”这一

类中。

③③ 尽管福兰阁从1937到1950年待在中国，他不能认为——也没有自认——是移民。一方面，他主要在德国机构工作；况且，在德国军事胜利的最初阶段後，他申请加入纳粹党，出於实用主义的考虑其未来在德国学术界的前景；见《中国之魅力》123页。（足够幸运的是，他的党员资格未成为事实。）

③④ 1937年的记载，颜复礼1935年始即任汉堡大学的汉学职席。1941年记载，施坦格在哈隆移居英国後第二年（1939年），接替了他在哥廷根职位。见瓦拉文司《Friedrich Ernst August Krause：少校与东亚学家》（汉堡：C.Bell Verlag, 1983），14-15页。1945年後，颜复礼和施坦格都由於政治原因被短期驱逐；见卫德明《德国汉学现状》320页，注①。据《帝国部委报告》6和9页，颜复礼1933年後曾是纳粹党成员，而施坦格於1932年1月入党（早期党员号为855624），也曾是纳粹党的“风暴骑兵”的成员。

③⑤ 颜复礼《德国汉学研究现状》，98-99页。Felber，《适应与反抗之间》83页，注②，提到海尼士於1937年7月给柏林大学写了封信，请求《泰亚》第10卷的出版资助。

③⑥ 颜复礼，《德国汉学研究现状》德文版，563页。

③⑦ 施坦格《德国汉学》，54-55页。

③⑧ 写作这些报告的另一动力也许是在德国学术界中资金及职位的竞争，中国研究仍缺乏宽广的基础。

③⑨ 《帝国部委报告》，1页。

④⑩ 《帝国部委报告》，2页。类似的陈述可在施坦格1941年的《帝国汉学》52页中发现。

④⑪ 《帝国部委报告》5-17页。列举了有建树的老师和年轻一代的学者，在许多例子中，报告分别给予了政治评价（有些时候是批评），并提到党员资格的事实，一般包括入党的年份和党员的号码。

④⑫ 福兰阁，《怀念哈隆（1898-1951）》，《德意志东方学会学报》102（1952）：2。

④⑬ 为避免任何误释，应注意福赫伯以其《汉学》（1953年出版）纪念他的老师哈隆。

④⑭ 参见傅吾康为白乐日写的讣告：“三十年代初不断恶劣的政治局势使他日趋悲观，德国在当时非人道的极权主义体系的扩大，使他被迫离开这一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德国。1935年他移居巴黎。”（《纪念白乐日》，“《远东》”1965年12期：1页）。1952年讣告後的十六年，在以上引用的他的《德国大学的汉学》中，福赫伯将哈隆列入政治移民之列。

④⑮ 中德文化学会成立於1931年10月，由郑寿麟（1900年生）创办。作为一个促进德国文化与科学进步的中心，1933年5月始由一名中国人和一名德国人领导，在

德——中理事会的指导下工作。中国教育部及德国大使为其名誉主席。最初中文名为“德国研究会”，1933年改为“中德文化协会”，1935年改为“中德学会”。该学会旨在满足学术及实践的需求：帮助那些欲学习德文、访问德国或申请奖学金的中国机构和个人，并出版德国科学、文学著作的中文翻译系列。另外，它有一个自己的图书馆，主要是德国文史哲著作及關於德国的中文书。1935年始协会在北京北半部，靠近各大学及国家图书馆。1945年8月，德国单方面自协会撤出，然而协会在国家图书馆指导下仍继续存在了几年。傅吾康虽然断言协会成立资金主要来自於德国外交部，但它保持了与随即的政治干预的相对的自由。毫无疑问，中德学会也服务于宣传的目的。见Francoise Kreissler：《德国在中国的文化活动：从十九世纪末到二战》，巴黎：Maison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89, 184-195页。關於中德学会，也见傅吾康《中国之魅力》60-68, 142, 167页。

④⑯ 见傅吾康《中国之魅力》，64-65页。

④⑰ 《东亚自然与民族学协会通讯》1952年第72期：8-18页。

④⑱ 他在《现代世界》1960年第1期422页说：1933-1952年移往美国的汉学家数量是“仅仅少於”那些留在德国的。这一陈述的背景是战後国际学术合作的考虑而已。在他的文章中，傅吾康没有提到移民對於“德国中国研究现状和问题”的真正冲击。

④⑲ 在战後立即或很快离开德国的学者包括艺术史学家罗尔（1903-1988），他於1936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博士学位，於1941年任北京的中德文化协会主任，直至1945年。他在北京待到1949年，後回到慕尼黑民族人类学博物馆。1951年到美国任密执根大学远东艺术和考古学教授。1960年接受哈佛大学东方艺术的Abby Alrich Rockefeller教席，直至1974年退休。见《美国学者辞典》第7版，（纽约：R.R.Bowker, 1978）1：417；《美国艺术名人录》第17版（纽约：R.R.Bowker 1986），623页；以及James Cahill《70岁的马克斯·罗尔》《东方艺术》1975年第10期：1-10页；和Robert Bagley在《亚洲艺术档案》1989年第42期：86-89页所写（包括书目）；Susan Bush在《东方艺术》1989年第35期：69-70页，和 Helmut Brinker在《慕尼黑：民族人类学研究》1989年第2期：283-290页。罗尔在北京的日子，见傅吾康《中国之魅力》，112-123页，146-147页，167页。Aschwin Lippe（1914-1998）也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史家（1942年在柏林获博士学位），去纽约地中海艺术博物馆，1949年任高级研究员，从1949年到1973年退休任馆长，见Sherman Lee撰写的讣告（包括书目），在《亚洲艺术档案》1989年第42期：84-86页。汉学家Werner Eichhorn（1899-1991）（1926年

在哥廷根获博士学位:1937年在波恩取得任职资格),1937年始任职於德国和奥地利的大学,1949年在牛津Bodleian图书馆做助理馆员;在那里一直待到1961年,他成为杜宾根大学的汉学教授,在这一职位上直至1970年;见《当代作家》(底特律:Gale Research)29-32卷(第一次修订版,1978),182页。战後不久由於不同的理由学者们出走海外(包括因他们刚刚过去的历史所带来的政治问题);尽管有时与由於纳粹政权及战争所带来的德国学术界的艰难的学术及物质处境有关係,我们必须将这些例子与过去的政治移民或避难者严格区分开来。

㉔ 在这个德国学者的限定下,我将包括奥地利人黑尔芬·冯·扎西和施瓦茨(Ernst Schwarz)。黑尔芬在莱比锡学习,纳粹掌权时,他本打算在柏林开始其学术生涯。施华滋战後从中国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并任教於柏林洪堡大学。只有冯·扎西似乎与德国学术界没有联係,但因为共同的语言和知识文化——冯·扎西1927-1928年曾在柏林工作(见下)——我认为应将他包括进来。

㉕ 这里展示的多数学者曾被Walravens详细地关注并描述过。然而,我增加了一些学者,并做了修正和补充,尤其是關於生平细节、讣告和发表的书目。另一方面,因为我主要集中在研究中国或东亚艺术史研究的职业,瓦拉文司列入的学者将不以概论的次序出现,但会在这里提及,即Leonhard Adam(1891-1960),Willy Baruch(1900-1954),Walter Fuchs(1888-1966,外交官,不要与同名的科隆的汉学家相混),Curt Glaser(1879-1943) Eduard Freiherr von der Heydt(1882-1964),Stephan George Kuttner(1907年生),Alfred Oppenheim(1873-1953),Lucian Scherman(1864-1946),Gerd Wallenstein,Karl With(皆1891年生)。三个不寻常的例子是Vincenz Hundhausen(1878-1955),John Hefter(1890-1953)和Leonardo Oltschki(1885-1961)。Hundhausen只是在晚年学了少量汉语,并从未有过中国研究的职位。他1923年去北京直至1954年被要求离开。作为一位出色作家,他在中国学者帮助下做了有价值的翻译工作,特别是在中国诗歌戏剧上;他在北京还有他自己一个小出版社,见《东亚自然与民族学协会通讯》1956年79-80期:142-147页上Herbert Mueller写的长篇具有资料性的讣告。John Hefter也未在大学里学习汉语,但自己在柏林学习过古汉语并出版了一些汉学文章和翻译作品。二战前他离开德国,在重庆、昆明和上海作秘书、老师和翻译。战後被遣返回国并死在柏林;见Martin Gimm编《两部清代中国歌剧》(威斯巴登:Franz Steiner,1993)9-12页,505-508页(包括书目)。Oltschki,海德堡大学的罗马语族的语言犹太教授,1933年被离职。後去意大利,在罗马大学工作直到第二次1938年被驱逐。隨後,他移往美国,起初工作在不同的临时职位上,直至1944

年成为伯克利东方语言学系副研究员,1948年成为讲师。从1950年开始学习中文,发表《马可·波罗笔下的亚洲》(意大利语1951年出版,英语美国版1960年出版)。1950年,他又被伯克利解聘,理由是他没有在“忠诚的誓言”签名。1952年“誓言”被宣布违背宪法後,Oltschki那时住在意大利,被恢复原职,但没有回到职位上,不久後就退休了。见Arthur R. Evans, Jr.,“Leonardo Oltschki 1885-1961”,《罗马语族语文学》1977年第31期:17-54页,特别是41-44页;《1933-1945年中欧移民传记手册》(德文题为《1933年後德语区移民传记手册》)Werner Roder和Herbert A. Strauss编。(慕尼黑和纽约:K.G.Saur,1980-1983),2:874页。

㉖ 见Wolfgang J. Smolka《慕尼黑的民族人类学:机构化的前提条件、可能性及其发展轨迹(1850至1933年)》(柏林:Duncker&Humblot,1994),290页。

㉗ 见Harrie Vanderstappen撰写的讣告,以及Diane M. Nelson编纂的书目,在《亚洲艺术档案》31(1977-1978):110-112页。關於大量的书目(和一些传记)资料,见瓦拉文司《德国东亚艺术史书目1:Adolf Fischer,Frieda Fischer,Karl With,Ludwig Bachhofer》(汉堡:C. Bell Verlag,1983)及瓦拉文司的《德国东亚艺术史书目2:Alfred Salmony》的增补(汉堡:C. Bell Verlag,1984), -。

㉘ 《东方语言系通讯》34(1931):1-92页;35(1932):1-73页;36(1933):1-62页。

㉙ 他的一些德文及法文文章後译为英文并发表於《中国文明及官僚主义》H. M. Wright译(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

㉚ 两个长而富含资料的讣告,见Paul Demieville在《通报》51(1964):247-261页(包括书目),和傅吾康的《远东》12(1965):1-5页。

㉛ 《美国东部名人录》19版(芝加哥:Marquis,1983-1984),123页;《美国学者指南》第7版,(1978),1:87页。

㉜ 见《William Cohn博士书目:纪念其75岁生日(1955年6月22日)》,George Hill编(牛津: Bruno Cassirer,1955)。

㉝ 《国际传记辞典》,2:192页;一则讣告由Peter C. Swann在《东方艺术》7(1961):90页上发表。

㉞ 同上,2:193页。

㉟ 见鲍吾刚为爱伯华写的讣告,载《巴伐利亚科学院1992年年报》(慕尼黑:Verlag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93),218-219页。關於Adam von Trotzu Solz,见Hsi-huey Liang《中德关係:中德间的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1900-1941》(Assen:Van Gorcum,1977),147-157页。

㊱ 作为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德国移民的居巢的

土耳其大学的意义,见Horst Widmann《逃离及教育帮助:1933年後在土耳其的德语学术移民》(波恩;Peter Lang 1973),和Fritz Neumark《避难在博斯普鲁斯海峡:1933-1953年间德国学者、政治家及艺术家在逃亡》(法兰克福:Josef Knecht,1980);又见Bentwich《逃亡学者的营救与成就》,53-56页。1933年後,144名移至土耳其的德国与奥地利学者由法兰克福医学教授Philip Schwartz及其在瑞士的“急救协会”组织(见《逃离及教育帮助》,131-132,167页)。大规模的学者移居土耳其源两件毫不相干的历史事件的巧合: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和土耳其大学体制的现代化需要大量的外国教授。相应地,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学术移民的地位和责任就与其他国家的处境全然不同。

⑥⑤ 《国际传记辞典》2:232页有所记载,一部分在瓦拉文司《纪念爱伯华》,《远东》1990年第33期,7页。根据《现代作家》新版系列1981年2卷195页,Eberhard 1952、1957、1969、1978和1980年在德国教书;又见《埃伯哈德:简短的传记》,在《中国的传奇、知识和信仰:埃伯哈德七十寿辰纪念文集》,Sarah Allan和Alvin P. Cohen编(洛杉矶:中国资料中心,1979),xxiv。

⑥⑥ 这一资料见Alvin P. Cohen《纪念爱伯华(1909-1989)》,《亚洲民间研究》49(1990):128页;又(同一讣告)《中亚杂志》34(1990):180页。Cohen是指在《中国的传奇、知识和信仰》225-266页中的书目。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德奥教授被希望用土耳其演讲并出版:起初求助于口译者和笔译者,後来则全由自己来做;见Helge Peukert为Philip Schwartz的《急救协会:1933年在土耳其的德国科学家移民》(Marburg:Metropolis,1995,22-23页)中写的前言。

⑥⑦ 见Liang《中德关系》,149-151页。

⑥⑧ 应该注意的是纳粹十分清楚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的研究与出版活动。据《帝国部委报告》2-5页,这些十分活跃的活动被认为与纳粹意识形态相抵触。“报告”认为北京和东京的天主教大学是强大的“作战单位”,并将《华裔学志》连同其在日本的同类刊物描绘为一种垄断学术出版的思想工具。《华裔学志》的出现正好填补了《泰亚》1935年停刊造成的间隙。另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是1949年《泰亚》在英国复刊,恰逢《华裔学志》1948年在中国压力下停刊。(後在他国复刊。)

⑥⑨ 见Pierre Jaquillard所写讣告,《亚洲艺术》34(1972):115-118页,包括课程简介和书目。艾克斯在北京的角色,见傅吾康《中国之魅力》68页。

⑥⑩ 《国际传记辞典》,2:319-320;《当代作家》61-64(1976),198页;又见David R. Knechtges,《傅汉思:教师和学者》;于文所安,《傅汉思,温和变革者》;Knechtges,《傅汉思著作部分目录》,《唐研

究》13(1995):1-11页。

⑥⑪ 傅熊《忘与亡:奥地利汉学史》(波鸿:Project verlag,2001),231-234页。《国际传记辞典》,2:454页;亦参照福赫伯所写传记。《德意志东方学会学报》102(1952):1-9页,E. B. Ceadel所编书目,《哈隆发表作品(1898年1月12日-1951年11月24日)》,“《泰亚》”,3(1953):107-108页;和瓦拉文司,《Friedrich Ernst August Krause》,11-15页。

⑥⑫ 资料来源於瓦拉文司所写的讣告(带传记),刊於《东亚自然与民族协会通讯》159-160(1996):13页。

⑥⑬ 瓦拉文司所写讣告(见上注),13-14页:《美国妇女名人录》第5版,(芝加哥:Marquis,1968-69),674页;《美国西部名人录》,15版,(芝加哥:Marquis,1976-77),404页;更多的资料见於华盛顿大学个人服务部。

⑥⑭ 见Richard C. Rudolph所写讣告,《远东》9(1962):1-5页(包括书目),和Alexander Wayman,《亚洲艺术》25(1962):193-194页,及瓦拉文司的《勒辛教授书目补编》,《远东》22(1975):49-58(包括传记和一份由勒辛1933年後写的早期简历;《国际传记辞典》,2:712。又见上注25。

⑥⑮ 《中印研究》第5卷,1957年第3和4部分:Kshitis Roy编《李华德纪念文集》7-9(包括到1957年的目录。《德国学者日曆》第14版,(柏林、纽约:Walter de Gruyter,1983),2497;《国际传记辞典》,2:727页。

⑥⑯ 见傅吾康《中国之魅力》,121,136,145页。

⑥⑰ 《美国学者指南》,6版,1974年,1:383。Michael Pollak所写讣告,与Loewenthal著作目录,由瓦拉文司编,见《华裔学志》45期,1997,415-437页;又见Michael Pollak《中国犹太教参考书目》(辛辛那提:希伯来联合学院出版社与中国犹太教研究所联合出版,Palo Alto,1988)“导言”7-13页。

⑥⑱ 见上注26。

⑥⑲ 傅熊《忘与亡》,227-229页。《国际传记辞典》,2:761;《当代作家》1983年109卷,294页;《美国传记大全》(纽约:James T. White & Co.),54卷,1973年,550页;在福赫伯《新德国人传记》中卷15(柏林:Duncker & Humblot,1987)636页。讣告见Money Hickman《东方艺术》17(1971)183页,和Robert Göbl《中亚杂志》13(1969):75-77页;书目,见Charles King《匈奴人和中亚:冯·梅兴-黑尔芬著作目录》,《中亚杂志》40(1996):178-187页。

⑥⑳ 《国际传记辞典》,2:815-816页;Marie-Luise Näth所写讣告,《中国季刊》138(1994):513-516;《美国南部及西南部名人辞典》(Wilmette, :Marquis,1976-1977),15版,525页;Franz Michael个人笔记和论文(到1965年,5个盒子)在华盛顿大学的档案中。1963年前的

书,见Gerald Stourzh《在美国的德语国家移民的出版物》第2部分及後补,《美国研究年报》11(1966):282-283。据《国际传记辞典》,Franz Michael 1979年前著作的完整目录可在纽约犹太移民研究基金会找到。

⑧⑨ 《美国学者指南》,8版(1982),3:385页;《美国及加拿大图书馆员传记指南》,5版(芝加哥:美国图书馆协会,1970),762页;Martin Gimm《一篇John L.Mish的遗文》(包括Mish的满族研究目录资料)。讣告,见《亚洲研究杂志》53(1984):615页;1983年8月28日《纽约时报》和《纽约时报传记机构》14卷,1983,972页。

⑩ 其父亲Oscar Münsterberg(1919年去世),发表了《日本艺术史》(1904)和《中国艺术史》(1910)。

⑪ 《国际传记辞典》,2:840页;《当代作家》,1981年2卷499页;《美国艺术名人录》20版,1993-1994,837页;又见ElizabethBrotherton写的讣告,《亚洲艺术档案》,1995年48期:100-101页。

⑫ 《傅熊:忘与亡》245-265页,《美国学者指南》4版,1964,3:204页;《美国教育名人录》21版,1141-1142页;个人论文(9个盒子),在华盛顿在大学档案中,与HenriettaReifler访谈的文字本收入华盛顿大学的档案中。瓦拉文司《德国的东亚科学家及其流亡》239页,提到了一些他的语言学著作;他关于度量的作品於其去世後以缩微平片的方式发表,见H.J.Griffin和ErwinReifler《度量衡制的比较史》(伦敦、纽约:Mausell,1984)。

⑬ 《国际传记辞典》,2:1011页;《学院艺术杂志》18(1958):77页收入的讣告;J.F.Haskins讣告在《亚洲艺术》21(1958):285-286页;A.B.Griswold在《考古环顾》(1960):104-106(包括书目注释;艾克在《东方艺术》4(1961):453页。《纽约时报》发表了一则1958年5月3日的讣告。关于萨尔莫尼最为详尽的资料可在瓦拉文司《德国东亚艺术史书目,2》(汉堡:C.Bell Verlag,1984)中找到。

⑭ 关于《泰亚》的书目和索引,见瓦拉文司:《泰亚(1921-1975):德英东亚杂志:书目及登录》(Wiesbaden:Harrassowitz,1997)。

⑮ 《国际传记辞典》,2:1032页;《泰亚》,11(1965):93-95页;海尼士《布鲁诺辛德勒和一位亚洲老少校》,《远东》12(1965):7-9页;和Paul Demiéville《通报》51(1964):461页。

⑯ 《国际传记辞典》,2:1033页:《美国学者指南》,8版(1984),673页:《当代作家》,107卷(1983),461页。

⑰ 如其他机构一样,美国基督教金陵大学(1888年成立,1952年解散)於1937年日军入侵後西移。1938年前期到1946年夏大学在成都。见《南京大学大事记(1902-1988)》(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189-226页。

⑱ 施瓦茨传记材料,由Thomas Vasek发表在奥地利

杂志《传略》44期(1994年10月31日),46-50页,有关於他长期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全部服务的资料,见Robert Buchacher和Thoms Vasek;一篇署名的文章《共和国风俗画》发表於《传略》杂志第3期。由他自己得到的额外的资料包括一个个人声明和在1994年10月24日南德广播上播放的自传广播稿。根据“声明”,1960年他被标以“资本家”的标籤,只能前往民主德国:“离中国去奥地利,一个资本国家,我就从未被准许过。”他的未刊论文《屈原研究之问题》被T.Kampen《1949-1990年间东德关于中国研究的博士论文及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引用,《亚洲》60(1996):170页。关于施瓦茨最全面的消息,见傅熊《忘与亡》。

⑲ 《国际传记辞典》,2:1085页;《名人录》(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73-1974),2966页;C.R.Bawden:《西蒙1893-1981》,《英国学院报告》67(1981):459-477页;其中1963年前的书目,见申得乐《西蒙教授的书目》,《泰亚》10(1963):1-8页。费路《适应与反抗之间》,82页,给予了以下不同的日期:1929为讲师,1932年为教授。

⑳ 《前言》,在Strickmann所编《密教与道教研究:纪念斯坦因》1卷,(布鲁塞尔:比利时中国高等学院,1981);1981年前的书目见17-20页,又见施舟人《欧洲道教研究史》,见Ming Wilson和John Cayley编《欧洲中国研究:欧洲汉学史国际会议论文集》,(伦敦:寒山堂书店,1995),481-482页。

㉑ 瓦拉文司《德国的东亚科学家及其流亡》,240页,错误地认为他死於1956年;据《远东季刊》14(1955),314页,他死於1954年9月10日。

㉒ 《美国学者指南》(1942编年),855页;他在长沙的职位,在傅吾康《中国之魅力》61页中提到。其“曹操的诗”载於《华裔学志》4(1939):125-181页。

㉓ 《美国学者指南》8版,1982,1:792页;《美国名人录》51版,(New Providence:Marquis,1997)2:4388页。

㉔ 他从这一职位上退下来的背景见上。

㉕ 《当代作家》5-8卷(第一次修订,1969),1249页;华盛顿大学个人服务部的资料;《卫德明,回忆和书目》,《远东》35(1992):5-34页(由D.R.Knechtges,G.E.Taylor,D.W.Treadgold,F.W.Mote和福赫伯投稿);F.W.Mote《卫德明:一条传记》《华裔学志》29(1970-1971)3-6页;高慕柯《卫德明,汉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通讯》8(1989):27-51页;早期的书目记载包括“卫德明1968年前出版目录”,《华裔学志》29:7-12页;瓦拉文司《卫德明1968年前出版目录补编》,《华裔学志》30,634页;瓦拉文司《卫德明1968年前出版目录再次补编》,《华裔学志》32,400-403页;Ursula Richter

《回忆卫德明：1905-1990》，《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1(1991)：131-139页。

⑥《国际传记辞典》，2：1253页；《美国学者指南》8版，(1982)，838页；《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纽约：自由出版社，1979)，18：812-814页；《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Greenwood Press, 1985)，431-432页；G.L.Ulmen《社会的科学：了解魏特夫的生活和工作》(The Hague: Mouton, 1978)，包括书目1917-1977(509-523页)；Kar I.H. Menges所写讣告，《中亚杂志》33(1989)：1-7页。《纽约时报》(1988年5月26日)和伦敦《时报》(1988年6月18日)也有讣告；又见《纽约时报传记服务》19(1988)：626页。

⑦ 1997年10月24日的个人书信在华盛顿大学。其出版物包括《周作人》(纽约：Twayne, 1971)和《中国研究：书目指南》(洛杉矶：中国资料中心，1981)。

⑧ 福赫伯，《德国大学的汉学研究》，31页。

⑨ 见Horst Möller《移民中的科学家：数量及地域方面之观察》，《科学史报告》7(1984)1-2页；又见Möller的《文化之出埃及记：1933年后移民中的作家、科学家及艺术家》(慕尼黑：C.H.Beck 1984)，38-46页。

⑩ Möller，《移民中的科学家》6页和《文化之出

埃及记》，102-118页。

⑪ 艾克斯《德国汉学的文化政治涵义》，40页。

⑫ Möller，《移民中的科学家》，7页。

⑬ Bawden《西蒙》提到在1946和1947年西蒙“由座落於城市苏维埃部分的柏林大学提供了一个汉学职席，但他拒绝接受。对这一请求的拒绝也许没有花费太多的考虑：在我看到的他与学校通信中没有提及这一情况，得知此事是从一个私人的通信中透露”。

⑭ 据《屈尔施讷德国学者日曆》12版(1976)3100页，1946-1953年，施坦格没有学术职位。1953年后的职位是“编外教授”，从未有全职教授的称号。

⑮ 肯尼迪1932年自上海到柏林，在东方语言讲习班通过中文及日文的学位考试前，在大学里学习了4个学期；见其毕业论文《中国法律中坦白的角色》(柏林：自刊，1939)中的简历。据《纽约时报》1960年8月17日上的讣告称，他於1934年在柏林获博士学位，《名人录》卷4(520页)中载为1937年，即在他入耶鲁大学后，这个日期也在Tien-yi Li编的《肯尼迪选集》(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6)511页中的《乔治·肯尼迪年表》中注明。

## 中国与世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1840-2000)

——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维也纳大学举行

李帆

李帆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2004年5月17-18日，在维也纳大学汉学系召开了以“中国与世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1840-2000)”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奥地利、德国、意大利、荷兰、英国、瑞士、俄罗斯、乌克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近百名学者与会。

会议开幕式由维也纳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魏格林(Susanne Weigelín-Schwiedrzik)主持，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卢永华以及维也纳市政当局的代表等来宾致辞。开幕式后，会议分成13个小组(Panel)，围绕近代中国百余年来变化展开专题研讨。研讨的核心问题为“从帝制到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变”、“新政治秩序探索过程中的中国：从自我封闭到向世界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从殖民地、半独立到全球化时代”、“国际语境中的中国身份认同：知识分子的声音”、“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特性”等。这些问题涉及到中国近代政治、经

济、社会、思想、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其中一些个案研究颇有新意，反映了国际汉学尤其是近代中国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如对清末民初中国人种、文化认同危机的研究，对近代中国科学发展过程中全球化诉求和民族主义本位紧张关系的研究，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上海、山东在文化、经济上各自所扮演角色的分析，对大跃进运动的重新解读，等等。论域宽泛，学科之间交叉渗透，是这次研讨会最鲜明的特色。亚、欧、美、澳各大洲的学者济济一堂，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术理念所带来的激烈学术交锋，也凸显出当今中国研究本土化与全球化并行的特点。

近年来，在近代中国研究领域，由欧洲汉学家主办的规模如此之大、涉猎面如此之广的学术会议并不多见。此次会议的召开，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欧洲汉学在当今所具有的活力和生命力。各国学者的踊跃响应和纷纷与会，也表明这不愧是一次近代中国研究的国际性盛会。